

重构边界

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反思

Roger Bootle

经济学家应该对各种冲击习以为常。柏林墙倒塌时，基本上还没有关于怎样将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文献。那之后的若干年里，这一领域呈现出全新面貌，许多卓越的贡献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

面对当前的金融市场动荡，我们急需一次类似的破旧立新。在西方，并没有很多民众——我们也希望，并没有很多经济学家——想要转变为中央计划和广泛的商业公有化，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正在被重新划定。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碰到过这种局面，但这使问题变得更加令人困扰。20世纪30年代的事件带来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不过其发展并未在那段给人类带来无尽苦难的政治革命前发生。

吸取教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带来的教训，不可能存在令所有人都满意的总结。但我仍尝试提炼其中的精髓。第一，在萧条的情况下经济会陷入泥潭，私人参与者，无论是居民还是企业，莫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中唯有国家政府有能力为集体利益充分地运转。此外政府有两个职责，一是尽力防范危机，二是危机一旦发生，它要让我们摆脱危机。

第二，各个金融市场是不同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令市场屈服于本能冲动和羊群效应。鉴于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能对其放任自流。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干涉、管理、监督和约束。

革命与反革命

二战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关于市场与政府间宏观关系的凯恩斯观点一直广泛被许多西

方国家接受。不过该观点被之后的一场反革命推翻了。在知识分子的世界里，这一推动力来自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热忱地争辩市场是理性和高效的。相较而言，政府是低效的而且时常不理性。更有甚者，政府甚至并不总是代表公共利益，它们可能堕落贪污，或屈从于某些集团的利益。

或许这种观点的转变最清楚地体现在弗里德曼颠覆了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大萧条的解释。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大萧条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大萧条因投资者信心的崩溃而起，与货币经济制度的特点相互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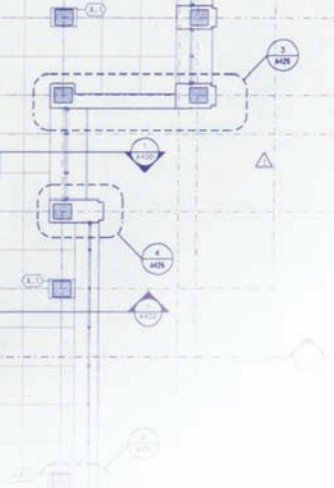
那弗里德曼的观点呢？——政策失灵。美联储犯了太多错误——最重要的是收缩货币供应量。若非如此，只会出现普通的收缩，而不是萧条，更不是大萧条。

弗里德曼的学术观点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中得到贯彻，两位领导人似乎完全抛弃了战后的措施。被认为从属于公共领域（尽管一些自由市场的卫道士甚至质疑这一点）的对货币的适当控制，将保证宏观层面的稳定；而竞争、打破常规、私有化和低税率将保证微观层面的高效。

从2007年到2009年的金融体系崩溃来看，如此多原本在自由主义者眼中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看上去荒诞不经。凯恩斯可能已经被夸大甚至被神话，但现在的证据表明，弗里德曼也一样。

正确看待凯恩斯理论

关于市场和政府角色定位的问题，最近的事件会给我们哪些启示呢？我相信它们重申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凯恩斯主义者所提出的教训。最重要的是，他们断言各个金融市场是不同的。抛弃凯恩斯



主义只会令我们身处险境。政府政策应受到控制，以防走向两个极端，并保持金融体系和经济的稳定。

企业高管的表现同样暴露出资本主义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一些在资本主义体系早期就为人熟知的问题。资本主义理论完全是在阐述自利行为将达到社会共同利益最大化。不过，企业大体上并非被它们的拥有者所运营，而是由聘用的经理人控制，他们拥有巨大的例行权力。学术上这被称为“代理人问题”。在银行业，尽管薪酬并非是危机的根源，但过度水平和超常结构的报酬依然是危机的重要帮凶——鼓励承担风险从而动摇整个体系。

更好的政府，而不是更大的政府

当然，此次危机并不仅仅是市场体系的失灵。政府失灵也难辞其咎。毕竟，如果你承认政府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中包括运用巨额的财政扩张），以保护经济体系不受萧条的冲击，你就将期望政府拥有和保持这样做的能力。

不过这意味着政府有权占据大量的财政资源。令人不安的是，许多西方政府在提供如此巨大规模的公共支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它们生怕越过临界点，导致市场担心政府违约。不过这种担心源于各国政府过往的表现，它们曾经大肆借贷，并且令债务在GDP中的比重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政府在萧条时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需要国家在平常时期将它从市场中抽取的资金最小化，并将债务占GDP的比率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然而西方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违背了这一点。

同样，在谈到需要进行更多监管的问题时，让我们澄清一点，市场其实已经承受了沉重的监管，不过仅仅是不当的监管。应对危机不是依靠更多的监管，而是更好的监管。

进一步讲，与其说这是微观监管的问题，不如说是宏观监管出现失误。失误不在于对特定市场的不当调节，而是对总体经济的错误管理——过度依赖信贷，容忍甚至维护房地产泡沫，以及在某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西班牙和许多东欧国家，过度依赖国

外资金维持其巨额经常项目赤字。

不过，谁将为这些宏观管理负责？肯定不是私人部门。这是政府失灵——各国财政部和央行——它们不但欺骗自己，还欺骗他人，沉醉于建立在不稳固基础上的虚幻财富带来的浮华中。

不要矫枉过正

现在最大的危险是我们在资本主义受到冲击时对其全盘否定。在金融以外的世界，这次危机并未显出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失灵——尽管资本主义身处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产物。在西方经济体中，对绝大部分而言，生产商品和劳务并且分配它们的这种通常的商业模式仍然运营良好。这些事件带给这部分经济的唯一教训来自严重的代理人问题。驯服贪婪的经理人，

“失误不在于对特定市场的不当监管，而是对总体经济的错误管理。”

并使企业行为与其股东的利益一致，不用担心整体的社会利益受损，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现在，整个高层管理人员已被证明不仅仅是贪婪的，而且是不称职的。最近的事件将危及民众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支持。

我担心更大的危险是，在2007年到2009年的事件后，厌恶和失望的情绪将带来对市场的普遍觉醒，仅仅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做他们擅长的事——激励，发送信号，从而鼓励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尤其是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道路使用这些领域。

我们确实需要修复金融市场，这意味着，政府以各种方式发挥更大作用。不过我们不需要更大的政府，也不指望通过干涉企业高管的权力来满足我们修正整体市场经济的需要。

Roger Bootle是总部设在伦敦的咨询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总裁。他的新书《市场的故障》将于2009年9月由Nicholas Brealey出版。